

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再认识

董 宝 训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学术界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的认识分歧涉及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如何认识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和如何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等一系列问题。根据邓小平理论有关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我们认为,我国过渡时期已经完全具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和根本任务决定了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过渡时期;社会性质;主要矛盾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1)01-0086-08

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分歧,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过渡时期属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另一种观点认为属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属于过渡性质的社会。分歧实际集中在过渡时期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上。与过渡时期社会性质相联系,在过渡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形成这种分歧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特别是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存在不同理解;另一方面则与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化程度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程度的双重局限有关。随着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进一步深入,化解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纷争的条件正趋于成熟。

一、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P314)}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这段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著名论述,成为认识过渡时期社会性质的重要理论依据。然而,对过渡时期社会性质认识上的分歧,恰恰也是从对马克思这一著名论述的不同理解开始的。否认我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性质的研究者

收稿日期:2000-03-21

作者简介:董宝训(1958-),男,山东海阳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那么毫无疑问,这个“过渡时期”,既不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属于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而是两种社会制度之外的另一种社会制度。他们将这“另一种社会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或者干脆就叫作过渡性质的社会。这一理解从字面上看好像颇有道理,但是当我们透过字面,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之后,就会发现上述认识不免有望文生义之感。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呢?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至少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过渡时期是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就立即开始了。

列宁认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最终达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都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起点是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开始的,过渡时期的长短是由不同国家的发展程度决定的。发达国家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镇压了剥削阶级的反抗之后,可以直接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则必须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我国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肃清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武装,没收官僚资本,土地改革等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所以,我国的过渡时期是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完成以后才开始的,而不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的。这种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列宁在谈到俄国二月革命后的时局时指出:“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2](P25)}同样的道理,国家政权转移到无产阶级手里,说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完成,社会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对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进行清除,对官僚资产阶级经济上的剥夺和对封建土地制度进行改革,不过是顺便完成前一革命的遗留任务而已。正如列宁所说的:“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3](P568)}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来说,过渡时期应该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完成前一革命遗留任务是在社会性质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以后,对少量尚未变化的部分进行量的消解,它花费的时间与整个过渡时期相比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无法从根本上影响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关于过渡时期的起点问题,毛泽东于1955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民主革命的基本完成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

第二,马克思所说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是过渡到成熟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过渡到实践中的不成熟不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只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是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和一切社会关系,以及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旧的观念。随着无产阶级专政职能的完成,无产阶级将从根本上“消除它作为雇佣工人的特性,因而消除它作为阶级的特性;随着它获得彻底胜利,它的统治也就结束了,因为它的阶级性质已经消失了。”^{[4](P288)}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政治上的过渡时期’;显然,这个时期的国家也是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就是说,‘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

了’。^{¶51(P29)}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想,社会主义将首先在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时取得胜利。当时,只有英、法、德三国最符合这些条件。1892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这样写道:“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只依靠英国一个国家。它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保证。”^{¶11(P403)}第二年他又说:“无论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61(P87)}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也承认,不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不一定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但这些国家要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只有在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国家的带动和帮助下才有可能。

可见,马克思所说的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指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这里,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已经充分具备,只要通过必要的革命手段,就可以由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完全不需要像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须经过的中间环节。正像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21(P547)}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自然不同于现实中的不成熟和不完善的社会主义,而是成熟的、完全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很显然,这样的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至今还没有变成现实。

由于社会主义不是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所以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标准去套用不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形显然是不合适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实践,对不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

第三,过渡时期的社会形态是社会主义性质。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能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现实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争议。第二国际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大肆攻击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是不成熟的“早产儿”,“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针对这些责难,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回敬道:“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31(P692)}在列宁那里,建设社会主义与最终建成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最终建成社会主义,是建成成熟的、完全的社会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预想中的社会主义。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21(P857)}而建设社会主义,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标志,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就全面开始了。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指出:“我并不幻想,我知道我们才开始进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我们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但如果你们说我们的国家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你们却是说得对的。”^{¶21(P427)}列宁一再申明,俄国还没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但同时,他也从不否认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的社会主义性质。1919年2月,列宁在起草《俄共(布)党纲草案》时明确指出:“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的革命在俄国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贫农或半无产阶级的帮

助下开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2](P736)}稍后,列宁在《关于组织农业工会的讲话》中又指出:“工农政权在各方面开始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它的任务不仅是扫除地主和资本家——这件事情我们几乎已经办到了——而且要建立一个无论地主或资本家都不能重新产生的社会。^{¶7](P20-21)}在俄国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因为新经济政策容许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同力图复活的资本主义,在通过市场来满足千百万农民需要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竞赛。^{¶3](P582)}1922年3月,列宁在讲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时候,更为明确地指出:“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我认为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党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染上了知识分子的习气,堕入了自由主义,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往往去看旧书本。可是旧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没有一本书提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对这一点也只字未提,没有留下一段可以引证的确切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3](P626)}

由此可见,不管过渡时期是如何不成熟、不完善,其社会性质毕竟是社会主义的。弄清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基本含义,为正确理解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前提。

二、应该综合分析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形态是指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既包括经济形态,也包括政治形态和思想文化形态,是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片面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置其他方面于不顾,或者将三个方面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做法,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认识上的误区。对我国过渡时期社会性质的认识,必须从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具体分析入手。

第一,我国过渡时期的政治制度属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的政治标准是什么呢?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归纳为这样几个主要方面:“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来具体考察一下我国过渡时期的政治制度。

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将要建立的新中国将实行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8](P1471)}。人民民主专政在建国之初就以《共同纲领》的形式加以肯定,1954年又庄严地写进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于建国初期还不具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所以,暂时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会议之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上下各级政权中普遍建立起来,并以宪法的形式予以肯定。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则在建国之初就建立起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在《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作了法律规定,并在实践

中逐步实行。由此可见,无论从国体还是从政体上讲,过渡时期的政治制度与邓小平理论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根本原则完全一致。

第二,我国过渡时期的五种经济成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

在我国过渡时期社会性质的争论中,五种经济成分成为否定我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性质的最重要论据。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只能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所以,五种经济成分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种认识误区至少表现在以下三点。首先,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忽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拿成熟的、完全的社会主义标准来套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其次,机械地看待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脱离开上层建筑孤立地看待经济基础,忽略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先于自己的经济基础而产生的特点。再次,脱离生产力,孤立地看待生产关系,忽视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统一。

按照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应该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9]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意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9]。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对外资企业采取管制、征用、代管、转让等形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到1949年底,社会主义工业的固定资产占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总量的80.7%。在全国大型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工业所占的比重为41.3%。在全国生产资料生产(包括手工业)中,社会主义工业占48%。国营经济拥有全国发电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产量的92%,钢产量的97%,棉纱产量的53%^{[10](P22)}。同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还控制了全国的铁路和其他大部分现代化的运输工具,以及大部分银行业务和对外贸易。尽管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国营经济在数量上还没有占到绝对的优势,但是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却是不争的事实。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公有经济不仅在数量上进一步提高,而且控制力也进一步加强。到1952年底,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分别达到19.1%、1.5%、0.7%、6.9%和71.8%^[11]。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仅在数量上不占优势,而且由于加工定货、经销代销等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实行,使其基本上纳入了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至于份额较大的个体经济,主要是农民个体经济,它是对封建生产关系的否定。就个体经济本身而言,它并不一定与某一种社会形态相联系,资本主义有个体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有个体经济。有人说三大改造前的农村和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存在着土地所有关系上的差别,三大改造前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可以自由买卖;改革开放后,土地归集体所有,不能买卖。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只见现象,未见本质。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天然的土地不是劳动产品,它没有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出卖土地实际上就是出卖定期收取地租的权利。在过渡时期出卖土地在很大程度上是出卖土地的使用权,因为土地在严格意义上是国家的。建国初期对土地私有的规定更多的是对农民私有观念的一种迁就和照顾,何况《共同纲领》和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规定了农业合作化的方向,也就是说,土地的私有从法律上仅仅是一定时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过渡时期的出卖出租土地与改革开放后出让土地的承包权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大包干同三大改造前

的农民个体经营在本质上对立起来。很显然,过渡时期的五种经济成分正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层建筑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具体形式。

第三,过渡时期的文化属于社会主义的文化类型。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2](P694)}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就指出:“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13](P692)}《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内容。”^{[14](P25)}随后,人民政府在文化建设中进行了旧有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在高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明确教育面向工农兵和教育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向。

党和政府对思想工作高度重视,这一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组织了对唯心主义的大规模批判和对唯物主义的强有力的宣传,开展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对他们进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教育。特别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配合总路线的宣传,“使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国内树立了压倒一切的优势,使资本主义思想受到了深刻的批判”^[15]。党和政府把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思想的批判与爱国主义教育,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提倡结合起来,使过渡时期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社会风尚最好的时期之一。过渡时期的文化作为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在观念上的反映,它无疑属于社会主义文化类型。

通过上述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综合考察,结论很清楚,我国过渡时期属于社会主义社会。当然,这种社会主义还很不成熟、很不完善,它在许多方面还带有它刚刚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明显痕迹,但它毕竟是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把中国共产党形象地比做一个人,人有幼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如果把社会主义社会作同样的比喻,那么过渡时期就是它的幼年,它的确太幼稚,甚至于对自己的未来还充满着太多的迷茫,但它毕竟已经是一个人了。

三、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是与社会性质相联系的一个问题。考察社会主要矛盾是认识社会性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反过来,一定的社会性质决定着一定社会的主要矛盾。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学术界在我国过渡时期社会性质的认识上分歧严重,而在过渡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却能够统一认识,几乎普遍认为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认为这种认识是不符合我国过渡时期的实际的。

第一,在我国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应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为前提。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它从来没有机会上升为统治阶级,所以民族资产阶级不是革命的对象,而始终是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组成力量和人民一员的地位更在法律上得到庄严的确认。《共同纲领》指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的政权。^{¶141(P17)}诚然,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并非没有矛盾,但这种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这一点不仅在法律上得到明确确认,而且在实践上得到充分证明。因此,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说成是我国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

第二,在我国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是极不对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尽管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依靠力量,但双方的地位并不是对等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仅“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81(P1479)}。民族资产阶级自然不会心甘情愿地默认自己的从属地位,它们也曾试图改变,如建国初期在流通领域里兴风作浪,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施放“五毒”,在三大改造运动中的种种抗拒等等,但是这些几乎是毫无悬念的抗争只能使民族资产阶级更加无奈。形成这种结局的原因非常简单,“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81(P1477)}。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民族资产阶级过分弱小,无法从根本上构成对无产阶级的威胁。根据1979年11月中央统战部等6单位《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请示报告》,对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进行区别之后的资料显示,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按行业公私合营时认定的86万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其中有70万其实属于劳动者,也就是说,在过渡时期真正的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只有16万人左右^{¶161(P417)}。区区16万人不仅在数量上与当时中国近6亿的全国人口极端不成比例,而且无论从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地位上讲,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不是一种对称的关系。因此,硬要让民族资产阶级去充当过渡时期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这样的社会角色对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实在是强人所难。

问题很清楚,在我国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有矛盾,但它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那么,我国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我认为我国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们对于物质和文化日益增长的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第一,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之后,应当不失时机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是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中心任务决定主要矛盾,所以,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应该是人们对于物质和文化日益增长的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第二,在我国过渡时期,党和人民政府事实上始终是把发展经济,而不是把阶级斗争放在中心地位。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工作生产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81(P1428)}在建国初期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又明确规定,全党全国人民在三年恢复时期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纲领就是全面争取国家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其他各项社会改革,如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调整工商业、对旧有教育事业的改革、镇压反革命等等,都是为这个基本任务服务的。在建国后

的头三年里,虽然社会改革任务比较繁重,政治运动比较频繁,甚至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但这些都没有动摇和削弱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这一中心工作,而且从不同方面促进和保证了这一中心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圆满完成。在国民经济顺利恢复的基础上,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尽管在三大改造中出现了急躁冒进的严重偏差,但这一时期并没有偏离发展经济这一中心。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毫无疑问,过渡时期,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任务,这一中心任务决定了过渡时期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们对于物质和文化日益增长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重新认识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不仅是学术研究上的需要,也是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必然要求。站在邓小平理论的时代高度去俯视我国过渡时期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过渡时期已经充分具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由此也就决定了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物质和文化日益增长的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达成这样的共识,我们对发生在三大改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急躁冒进才会有更科学更深刻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7]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8]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 [9]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R].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10]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11]黄少群.评析建国初期社会性质问题讨论中的几个理论分歧点[J].教学与研究,1982,(3).
-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 [1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14]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党史参考资料(七)[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15]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1954年2月18日)[N].新华月报,1954,(3).
- [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拨乱反正(中央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李平生)